本版编辑：兰文飞
E-mail：t3@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7

黄土高原上的知青岁月

——《习近平时代》选载

□［美］熊玠 主编

在中国的民间语境中，将亲戚称谓用于国家领导人的例子，非常少见。毛泽东去世后有时会被称为“毛爷爷”。而起自网络评论和草根微博，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一周，就有了“习大大”这个称呼。

“大大”之称来自陕西省，在这个中华民族始祖发祥之地，它用来称呼父亲的兄弟。习近平老家在陕西省中部，他本人又曾在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抛洒青春。

这片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位于中国腹地，深厚的黄土层，在陕北区域可厚达150～180米。这里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生态脆弱，流水侵蚀之下，地表破碎，年均向黄河泻下十多亿吨的泥沙。

从15岁到22岁，沟壑纵横、山梁如刀削斧劈的黄土高原，见证了习近平的成人礼。

2015年2月13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5天，习近平带着夫人彭丽媛重回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他特意用当地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的婆姨（即妻子）。”

“近平回来了”——当地乡亲习惯这样称呼他。习近平自己掏钱给全村置办了年货，有饺子粉、大米、食用油，还有春联、年画，还在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老支书家吃了一顿陕北农家饭。

新华社通稿标题是《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22年前，正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也曾回到这里，后来他撰文详述青春岁月，题目就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诗人食指的诗句，描述的正是1968年末至1969年初北京知识青年启程下乡的情景。15岁的习近平，就在其中一列开往陕北的火车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本应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近1700万城市青年走向偏远乡村，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迁移，几乎所有城市居民家庭都被波及。

1968年至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目的之一是为了结束失控的红卫兵运动，同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这些连中学课程都满目空白的“知识青年”，却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在1969年1月这个隆冬，对于15岁的习近平来说，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却像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他跟随母亲住在中央党校，“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家属揪了出来。“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念《毛主席语录》，天天熬夜，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又被拉回去，甚至要被送去少管所，但当时少管所床位满了，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

恰在此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习近平马上报名，他选择了父亲当年所在的根据地陕北。“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专访时，习近平说，在北京火车站，知青专列上下哭声一片，只有他在笑，因为如果留在北京，有命没命都不知道。

15岁的北京少年住进了陕北土窑洞

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再换乘大卡车，最后步行10里山路，习近平到达梁家河，住进了土窑洞。他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书，同来的15名知青中，他的行李最重。

和习近平同时到达延安地区的是26800多名北京知青，他们被分配到12个县的2667个生产队。为了管理北京知青，北京市后来还派出了1200名插队干部。而四五年后，超过98%的北京知青都通过招工、招干、参军、考学离开了这里。

在2009年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时，《延安日报》刊登了一位地方干部的回忆文章，特别提到了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佼佼者，其中排在前列的就有习近平。文章说，当地老乡对习近平特别关爱，先是推荐他做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又推选他出席延安地区第二届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奖励。

但事实上，初到乡村的北京少年习近平心中茫然。

梁家河并没有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时流淌着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土窑洞就依着山坡顺势挖出，200多名乡民世代居住于此。

习近平回忆说，在陌生环境中，周围又是不信任的目光，最初感到十分孤独。

父亲习仲勋曾给他讲团结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但习近平说，上山下乡之初，他因为“没有长期观念”、忽视了团结他人而有挫折和教训。“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他曾在2004年面对延安电视台的专访中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发现剩下半个面包，已经变质，就随手喂了狗。“老百姓看到了，问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面包，他们吃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就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他还说，当地的劳动强度令他感到震撼。爬到山上，“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差不多”，已经气喘吁吁了，还要干活。

除了吃饭，中间只能休息一次，就是抽一袋烟，“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

他曾在三个月后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在那里，他的姨姨、姨父以自己革命生涯的经验告诫他，要找机会往群众里钻，往老乡那里跑，“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

而当时在城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习近平曾撰文回忆说，他和其他被清理的人一起，被关进派出所，一关就是四五个月，还要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的亲属也记得，大约在1969年冬天，因为在陕北吃玉米糁子吃不饱，腹中饥饿而衣衫单薄的习近平回过富平，亲戚给他做了一套棉衣，他很快又回了延安。

他融入成就了父辈的土地

城市既不可留，而回到梁家河，几乎又临绝境——最初同来的知识青年大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后来的近两年时间里，只有习近平一人坚守。

这时，16岁的习近平开始真正融入这片养育并成就了父辈的土地，和农民不分彼此，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砺，并从中品味出充实和快乐。

他曾数次回忆插队生活中跨过的“五大关”：

一是跳蚤关。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浑身都被咬肿，皮肤过敏，水泡溃烂。但两年之后就习惯了，无论被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没有精米细面，主食是粗粝的杂粮，玉米面窝头。曾经几个月吃不到肉，分到一点猪肉，顾不上做熟，就切下一片生肉放进嘴里。而后来陕北乡村的饭菜是他经常怀念的。

三是生活关。自己学着捻毛线，缝衣服、缝被子都是自己做，生活自理能力很强，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四是劳动关。习近平起初拿的工分还没有妇女高，两年后就拿到了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在陡峭的山梁上放羊，下雨刮风在窑洞里铡草，晚上看牲口；春天担粪，一担猪粪、牛粪有七八十斤重，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200斤，10里山路一口气走完。

五是思想关。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曾经嫌弃乡民身上有虱子，后来常常和他们睡在一个炕上，甚至合盖一床棉被。

习近平说，在陕北，让他受益终生的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比如，刚到农村时很教条，听说老乡是富农就会将其轰出去，后来才知道所谓富农只是因为养了几十只羊；看到要饭的就认为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因为农业凋敝，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妇女儿童出去讨饭，才能把粮食留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了解，让他感慨很多。

到梁家河一年之后，与农民日益亲近，习近平的窑洞已经成了村里的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听这个16岁的少年摆开书场，讲古今中外，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

父亲还在监管中，尚无明确结论，这是习近平始终难以摆脱的阴霾。

为了加入中国共青团，他写过8份申请书。为了入党，他写过10份申请书。

1973年，同去的知青在准备进入大学读书，而习家的背景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那一年，除了习近平，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已经全部离开，而习近平“下定决心不走了，要凭自己的本事，给村里做点事”。

沼气专家

20岁的习近平被推选为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这是构成中共组织体系的“细胞”。他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将陕北认作第二故乡。

打坝淤地时，他身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初春刺骨的冰水里。

至今，习支书带领社员打坝造出的良田，还年年长出颗粒饱满的玉米。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习近平在小油灯下读到后，立刻想到要将沼气引入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黄土高原。

他步行50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告诉县委想去四川学习制取沼气，而县委也正想推广沼气。3个月后，6名延川人前往四川“取经”，习近平是其中之一。

很快，梁家河成为沼气试办点。习近平带着人挖沙子，背水泥，烧石灰，备齐材料；沼气池漏水跑气，需要及时清理出水粪，他们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在炎热的盛夏，干了一天一夜。

他曾面对延安电视台的镜头回忆，第一口沼气池不出气，原因是导气管堵塞，“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是粪”。

梁家河的沼气池是陕北的第一座沼气池，也是全陕西省的第一座沼气池，而习近平治下的村庄，后来成为全省第一村，70%以上的居民用上了沼气。“那个时候我是天天到处督导，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沼气专家。”他说。

今天的梁家河村口立有一块碑，碑文记录着，习近平曾带领村民修建沼气池60口。现在，经过更新技术，沼气池仍在使用。

陕北作家曹谷溪，应该是最早将习近平写进新闻报道中的人。1975年9月20日，他在《延安通讯》上发表长文《取火记》，描述了习近平引进沼气的全过程。

后来，他又在博客中记述，当年去梁家河采访习近平，进村时路陡不平，吉普车打滑上不去，习近平和几个后生，一起用力将车子推进知青居住的院里。

人生罕见的两次痛哭

《取火记》刊出之时，习近平却要告别梁家河了。

当年清华大学招生，延川县有两个推荐名额。尽管此前因为父亲的原因，习近平曾被这座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拒之门外，但这次他的三个志愿仍旧都填了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领导仗义执言为他力争，在得到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首肯后，习近平终于能够走进大学之门。

在梁家河村人的记忆中，习近平不仅能干活、有主意，而且“爱看书”“好学”，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书籍，也有数理化。

新华社记者曾随同习近平在2015年2月重返梁家河。在当年住过的窑洞前，总书记说，我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第二天早起，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

延川县作协主席张思明在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的习近平时，曾听他谈起，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顺路找到熟识的一位北京知青借宿一夜，两人合盖一床被子。当时习近平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被这位知青给留了下来。这位北京知青多年后也成为中共一名高层领导。

习近平的“书友”不只是北京知青，还有不少当地的年轻人。梁家河村民武辉比习近平小一岁，在习近平的窑洞里，他看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

习近平还曾给村里年龄相仿的青年剃头，教他们蛙泳，并且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乡下伙伴。

在这片土地上，性格刚强、几乎从未哭过的习近平，却曾两次洒泪。

第一次是他的大姐不幸去世，“我正在那儿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个时候哭了”。

第二次就是在1975年10月7日，告别梁家河的那个早晨。

推开门，外面站满了乡民，他们只是静静等着，并没有叫醒他。习近平当众落泪，他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

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

这一天，全村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足足送出十多里。有13个和他要好的年轻人，甚至步行60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

第二天，他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除了习近平，那是青年农民们第一次照相，花了5元5角。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这张黑白照片在中共十八大后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14个人分成两排，前排坐后排站，所有人表情严肃。22岁的习近平在前排正中，他的头发略有点长，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脖子。而他的同伴们，有些穿着对襟衣服，还有人头上包着毛巾。

后来，新华社曾用这张照片制作了新媒体动画，逐一介绍习主席当年的“小伙伴”，他们几乎全部在黄土地上做了一辈子农民。

而在延安生活过的这一批北京知青，在1993年时就出了省部级干部8人，厅局级干部两三百人，处级干部有3000多人。

脚踏在大地上，脱胎换骨

习近平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在陕北将近7年，少不了周围人的保护和关键节点上的助力。

比如当时延川的县委书记申易，顶着压力拍板让他入党，推荐他上大学，因为他是“陕北的孩子”“南梁的后代”——这位县委书记的父亲是习仲勋、刘志丹等创建的南梁陕甘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比如跟他意气相投的公社知青办主任，冒着风险把他档案中的“黑材料”付之一炬。

习近平曾经直言，他有“黄土地情结”。

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陕北是个特殊的地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这里起事，称王不久又失去了政权。陕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转折之地，中共冲出国民党的“围剿”，在这里收拾人马、赢得民心，最终夺取政权。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兴亡周期律”的著名讨论也发生在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说。

而习近平则多次表示：“延安是我的生命之源，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做人要有理想和信念，对群众要有真感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些人生信条，都是在延安的岁月中深深融入他的血液。

还在梁家河时，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那时在当地是十分稀罕的，习近平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等农具给乡亲们用。

离开这里后，他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并联系捐资兴建了一座希望小学。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专程回到梁家河挨家挨户看望，为贫穷老人带去了慰问金，给孩子们带去了新书包、文具和用来提醒上学时间的闹钟。

2009年，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陕西调研考察，也去了延安，他亲自写下9个老友的名字，让秘书请来相见。

离开陕北40年，习近平和这片土地的“脐带”从未中断。“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5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他已经脱胎换骨，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

基层党组织如何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建设

□ 彭穗宁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组织中，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呈现出异军突起的态势。这些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对基层党建有着积极意义。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参与，对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提升社区党组织服务水平，二是拓展了党与社会新的联系渠道，三是培育了良性的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对基层党建也有着现实的冲击

由于社会组织在活动场所和服务功能等方面与社区党组织存在一定程度交叉，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客观上也就缩小了社区党组织传统功能的实现空间，对基层党组织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一是使传统的党群联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过去，党组织的实行的是“单位为主、社区兜底”的“全能全包型”管理服务。伴随着单位体制日渐“式微”和居民多元诉求的发展，“全能全包型”服务方式已经走向末路，党组织只能通过发挥杠杆作用和主轴功能，转向资源统筹型的间接服务。今天，基层公共服务大量是通过 “外包”，引领社区社会组织来承接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党组织与群众传统的直接联系。二是对社区党组织领导力构成了某种“挑战”。在计划经济时代，党依托“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几乎占据了社会的全部空间，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原有的党组织体系难以直接覆盖的“空白点”。在城乡社区，这些空白点主要由管理扁平、适应性强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所填补，这在客观上要求党组织能够让渡出一部分社会自主生长、自主调节的空间。同时，由于社区社会组织围绕群众多元的需求开展针对性的专业服务，其灵活的工作方式和扁平的组织架构相对于科层制的党组织而言，更容易获得群众认同。党组织在社区的认同基础和动员能力呈现出弱化趋势，这无疑对党的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更为严格的要求。

政治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对党在基层社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形成的冲击，必须做出战略性的回应。

加强党组织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社区党组织政治引领社会组织，就是要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向作用，使之成为服务群众多元需要“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力量。社区社会组织直接诞生于社会，同时又在社会中寻找自身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转型期我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多元的利益格局，决定了社会组织在利益诉求上有不同的取向，在制度安排与组织水平也有不同的特点，其能力和水平也由此有了高下之分。而且，我国社区社会组织总体上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要发挥在基层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党组织必须要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政治引领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基层党组织是国家政权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处理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基层党组织带有鲜明的社会职能，必须发挥服务群众的功能和作用，并以此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处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基层党组织带有显著的政治职能，必须发挥政治引领的功能和作用。服务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广大群众是党发挥政治功能的基础，而党的政治功能的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实现，又是更好地服务各类社会组织、服务广大群众的根本保障。必须立足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开展党的建设，借助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全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才能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政治导向服务和基础保障。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必须推进基层党建制度改革。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必须要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治理进步还是国家治理进步的前提。要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必须健全完善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服务中心、居民议事会、居委会、社会组织、居民等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这应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整体功能的根本保证。为此，党组织要完善区域化党建机制，以社区党组织为基础，统筹优化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类基层党组织设置，形成覆盖广泛、功能互补的组织网络，实现对党务资源、政务资源和社会资源充分整合，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的统筹能力和凝聚能力。在党建制度改革中，还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还必须在党组织和工作的有效覆盖上、社区社会组织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上，在基层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发挥积极作用等方面上，加大党的建设的制度改革力度。

党建科学化